

第一论

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征

一、俄罗斯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

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任何民族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欧亚说的一个杰出代表 Г. В. 维尔纳茨基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写道：“俄罗斯人的发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发展之地被 Г. В. 维尔纳茨基理解为一定的居住环境的社會历史和地理条件的总和，为生存在其中的人们打上自己特征的烙印。^①

因此，要认识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就不能不考察形成俄罗斯文化的自然地理、地缘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

（一）形成俄罗斯文化的自然条件

自然因素在文化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

^①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Начерт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Евра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М., 1992. С. 102 ~ 103.

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民间文学中。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总之，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

俄罗斯历史学家 B. O. 克柳切夫斯基在其名著《俄国历史教程》中一开始就分析了俄罗斯自然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正是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基础。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这一切决定了主要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耕种的特点和国家组织的类型，形成了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形成了民间文学幻想的形象和民间哲学最初的观点^①。俄罗斯现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说过，“俄罗斯精神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②俄罗斯土地的辽阔无比，俄罗斯平原的无边无际，这些强大的自然因素，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中保留下来。大自然在俄罗斯人那里是一种比在西方人尤其是在拉丁文化圈的人那里更加强大的自发力量。

无边无际的平原给了俄罗斯人特别重要的影响。在平原上，一切东西都显得那么柔弱而渺小；轮廓不可捉摸，变动也感觉不到，甚至连底色都显得胆怯。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宁静印象。平原有着辽阔的空间，人烟稀少，四周一片沉寂，观察者能感受到一种心平气和的宁静，一种让人沉迷不醒的梦幻和孤独荒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Соч. : в 9 т. М., 1987. Т. 1. С. 83 ~ 84.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邱运华等译。

凉的悲哀，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种无明确对象的思考，让人灰心丧气，又无法得出具体的思想。与俄罗斯自然环境中的大平原紧密相联的是俄罗斯文化深层的表现：心灵的温柔和谦卑，思维的捉摸不定和战战兢兢，心平气和的宁静和沉重的垂头丧气，追求精神的梦幻，趋向禁欲主义和创作的空灵性。它们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平原景观对东斯拉夫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间接反映在平原居民日常居所的建筑上。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与西欧生活方式的特点相比较，俄罗斯农民的居所非常简陋，没有考虑怎样生活方便，轻视家用设施的完善，给人一种移居者临时歇脚处的印象。^①从草原游牧民族的袭击不断带来巨大损失的时候起，东斯拉夫人就开始半游牧生活方式。这种半游牧生活方式在长达 11 个世纪的全部民族历史时期保存了自己的深层次基础，甚至作为类型上稳定的主要成分成为建构文明的主要因素。俄罗斯人在家庭设施和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特点，被斯拉夫派的 И. 基列耶夫斯基解释为俄罗斯人精神的特殊方面。俄罗斯人用提高宗教道德理想和对彼岸世界永不停息的追求来补充自己日常生活的外在困惑和痛苦。实际上，从远古时候起在东斯拉夫人的精神中就形成了外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粗陋与精神生活、内心的深刻内省之间的脱节现象。

森林和草原是东斯拉夫人生活发展的基本依托，Г. В. 维尔纳茨基指出，俄罗斯历史和地理的基础是森林区和草原区的对立，森林和草原的斗争。森林和草原之间的界限以前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现在仍然模模糊糊。无论是在景观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二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Соч. : в 9 т. М., 1987. т. 1. с.

者的区别都是模模糊糊的。^①从远古时候起，森林就是猎人的领域，而草原则是牧人的地盘。森林和草原总是处在一定的矛盾和对立中。它们的矛盾和对立，是游牧生活方式和定居生活方式的竞争，反映狩猎和采集经济与农耕、牧业的竞争，表现紧张狭小和宽广自在的二律背反，展示黑暗和光明的对比，显露眼界的封闭和开阔的反差。俄罗斯人对森林和草原抱有双重感情，领会为双重意义。森林和草原二者就其本身来说，在生活上是很重要的、有益处的、吸引人的，但同时又是有害的、充满危险的，对人来说是可怕的。因此二者不能单纯地作为自己的家园，作为本性所固有的自然要素来接受，或者作为别人的空间来拒绝，也就是说，对二者不能仅仅作肯定的或者否定的评价。在人民的意识中，二者不能成为完全被征服完全被人化或者一劳永逸地被抛弃的东西。

俄罗斯森林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材料和食品，东斯拉夫人从森林中获取衣食和取暖的物品。森林又是躲避外部敌人可靠的避难所，但同时它又隐藏着针对人的种种危险。对于人来说，它始终是异己的，由此产生了俄罗斯人对待森林的“不友好”和“漫不经心”的态度。由此产生了神话和民间文学中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恐惧。森林中有熊和狼，它们对俄罗斯人和他们的家畜构成威胁；森林中隐藏着强盗，在森林边开垦新地来种植粮食，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成功。俄罗斯民间文学与东斯拉夫人的神话一脉相承，说森林中住着对人和俄罗斯灵魂不怀好意的妖怪：凶恶的老妖婆、林妖、树精和来自地狱的鬼怪妖魔。俄罗斯人同时又与森林合作，利用它的馈赠，努力从它那里获得生存的资料，把它看做生命的源泉和死亡的归宿。

对于俄罗斯精神来说，草原的重要性也不低。一方面，草原象

^①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Начерт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Евра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М., 1992. С. 102 - 103.

征自由自在、大胆彪悍、放纵、豁达，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这是一个可以感受得到的无限宽广和奔放的形象，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形象，它的缺乏规范和限制既让人神往又使人害怕。另一方面，草原又是俄罗斯人无家可归和灾难的化身，是俄罗斯人孤立无助的具体表现，是俄罗斯人孤单生存困难重重的反映。此外，草原还是一个危险的空间，有着凶悍的游牧民族和到处游荡的盗贼，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预兆，完全破坏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安宁，往往使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成为泡影，变成不能实现的幻想或者过分模糊的虚构。

俄罗斯人主要是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进入欧亚大陆的历史的。但是在农耕的同时，俄罗斯人还是森林狩猎和草原畜牧业的中介。Г.维尔纳茨基不仅把俄罗斯人称为农业人（庄稼人），还称作林业人和牧业人。同时，俄罗斯人还是不同的自然经济领域的中介人，生活在邻近的部落和民族之间的中介人、商人。对于商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商贸的道路，首先是连接森林和草原的天然之路——大江大河及其支流。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人对河流的热爱克服了对森林和草原的那种“双重感情”。^① 河流是邻居 是养育者 是被作为家庭成员甚至家庭首脑来接受的，比如伏尔加河叫母亲河，阿穆尔河叫父亲河等。河流是水上和冰上的道路，培养人民的“秩序的感觉”和共同性，使沿岸的居民习惯与外人打交道，包括与相邻的民族交往，培养进取精神，集体行动的习惯，使分散的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互相交流生活经验，习惯于以物易物。如果说有什么自然因素促进了俄罗斯人形成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活动和商贸的习惯，那在罗斯这种因素就是河流。俄罗斯商人分布的地区：古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基辅、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伏尔加河沿岸的城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Соч. : в 9 т. М., 1987. Т. 1. С. 85.

市——下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等都是在河流的两岸，就是明证。

俄罗斯民族是在没有任何屏障保护的领土上形成的。除森林、草原、河流等基本自然因素外，面临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东斯拉夫人的生存之地十分寒冷，冬季漫长而严酷。现在对气候指数的分析证明，东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生存之地并不利于长久居住。在这里只有利用补充的能源才能生存，只有靠单调乏味的工作才能生存，遥远的将来有好日子过往往是一种奢望。东斯拉夫人居住地严酷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条件，千百年来把高度的自我节制提到首位。这种高度的自我节制使得东斯拉夫人成功地适应了恶劣的自然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条件。

俄罗斯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精神上保持对游牧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定居文明的自我意识，这常常产生使人痛苦的惊恐不安，导致无法解决的二重性。害怕失去自由（也许这种自由压根儿就没得到过）的忧愁压得这种意识喘不过气来。空间指向的无限性，由此产生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的精神宽广性（这种精神宽广性包含过太多的东西，甚至包括基本上不能相容的东西），平原的无边无际和处在平原上的道路既不知道目的地又没有尽头，这就是俄罗斯文化独有的特殊的时空，俄罗斯文化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统一。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俄罗斯大自然的简单和单调显而易见，缺少稳定。正是自然本身促成这种在自然和日常生活条件下的俄罗斯式的无根基性。俄罗斯人对自己住所和家乡的自然保留了一种流浪者漂泊者的态度，明显地表现出对周围环境缺乏预见。结果，曾是文化产物的现象成为国家的地缘特征和自然的灾难。对待自然的这种漫不经心或者毫不认真的态度，比如漫不经心地对待森林和矿产、江河和水库，环境保护和放射性危险成为俄罗斯国民直到 20 世纪利用自然资源的突出特点。这不仅反映在

俄罗斯文化的矛盾中和充满冲突的深层结构里，而且表现在俄罗斯文明的自身类型上。一方面，俄罗斯文明几乎与自然没有距离，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没有距离。俄罗斯文明为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玷污的自然天性而骄傲，放弃技术进步和西方的机器文明；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文明又不保护自己的自然，不计较自然的价值，力图用一切方法包括用野蛮的方法来征服自然，就像不知道生态学为何物，直到现在，即使知道生态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也是形式主义的、轻率的和迫不得已的。

别尔嘉耶夫特别强调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无限性、模糊性，对无限性的追求向往，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宽广。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包含在俄罗斯精神中的强大的自然因素，与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幅员辽阔联系在一起，与俄罗斯平原的无边无际联系在一起，与俄罗斯精神形成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实际存在的困难性联系在一起。别尔嘉耶夫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自然成分中总结出俄罗斯历史和文化形而上学的性质，认为俄罗斯历史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现象和过程之间的某些联系和一致是整个历史扑朔迷离的来源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如自然历法及其明显表达的周期性，循环往复，农业节日的固定语义和相应的典礼形式、对土地的崇敬犹如尊敬圣母玛利亚等，对俄罗斯文化以及古罗斯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及其重要。这独特地反映在俄罗斯人的自我称呼上。俄罗斯人对别国人民的称呼用的都是名词如 *китаец*（中国人）、*немец*（德国人）、*француз*（法国人）等，而俄罗斯人称呼自己用的却是形容词 *русский*。这具体地表现了俄罗斯人对自己现有的东西的从属性，与最崇高最宝贵的物质的关联性。这种最崇高的物体，这种现有的东西就是罗斯，就是俄罗斯大地。居住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人 保卫它 耕种它 爱护它 享受它的恩赐，得到它的保护，作它的孩子，就成为 *русский*（俄罗斯

人)。也就是说，是从属于罗斯的，是与罗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俄罗斯的大地是第一位的，而人及其部落、部族、种族的属性都是第二位的，是罗斯衍生出来的。实际上，罗斯的概念让人一下子想到是一个超民族的概念，一个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范畴。从总体上从属于俄罗斯大地的观念至今仍保留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中，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对大地母亲的崇敬，对最宝贵东西的载体——俄罗斯人的热爱，成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稳定主体。

对待自己的国家的恭驯虔诚态度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国家被理解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最高一级的机构。实际上，对国家崇拜，相信她的强大，相信她的保护，相信她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的公正性，渴望为国家服务和牺牲一切，这些只是对大地母亲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拜转移到国家身上的结果。由此产生了著名的怀乡崇拜的感情，这是俄罗斯侨民最鲜明的特点。别的民族的人，一旦滞留国外作侨民、难民、流放者，本性上可能具有怀乡的感情，但决不像俄罗斯侨民在一切情况下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把遥远的也许永远也回不去的祖国神圣化的乡土崇拜的感情。这种民族表现间接起源于民族对自然的崇拜。

（二）俄罗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四周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保护，来自东方游牧民族经常性的民族灭绝的威胁和来自西方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威胁，迫使俄罗斯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寻找安全的疆界，不得不不断征战，不断扩张。和平只是极个别的例外，战争则是残酷的法则。特别是与英勇善战的草原游牧民族比邻而居带来了太多的惊恐不安，在大草原的边缘区居住的东斯拉夫人半军事、半游牧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危险的邻居逼出来的结果。这种使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自我节制提到首位，

这首先表现为勇敢的尚武精神。其次，表现为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同时外部的不断威胁和战争，也促进民族或部落紧紧地团结起来。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地处欧亚大陆的交汇处，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在这里东西方各民族之间征服兼并的战争连绵不断，曾几何时称霸一方的民族也难免饱受异族的入侵之灾，征战者的铁马金戈往往带来的是民族迁移的浪潮，而民族大迁徙导致各民族汇集交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激烈碰撞和融合，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影响。为这里最终生存下来的文化深深地打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烙印。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文化还在襁褓中就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影响。

（三）俄罗斯文化的民族起源

古罗斯从一开始就与众多民族比邻而居。利哈乔夫认为，罗斯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国家，罗斯的周围也是多民族的^①。在形成新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除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外，还有芬兰—乌戈尔民族、立陶宛部落、楚德人、默里亚人、维西人、莫尔多瓦人、车累米斯人等。《往年纪事》从描写罗斯与谁为邻，与哪些民族结合开始叙述罗斯的历史不无道理。俄罗斯文化就是在众多民族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不仅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众多的民族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意义非凡，罗斯的周围众多民族对罗斯文化的形成也影响深远。在北方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亚人，南方主要是希腊人，其他重要的邻居还有保加利亚人和哈扎尔人。

历史学家、哲学家 М. Я. 格夫捷尔把俄罗斯称为“世界之中的

利哈乔夫·德·谢：《解读俄罗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5 页。

世界。”世界之中的世界’意味着多样性中的统一，包括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从本源上讲，有着上千年发展历程的俄罗斯文化，严格地说不是纯粹单一民族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不能认为它是纯东斯拉夫文化。因为从历史的一开始，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就受到了来自南方和东南方的突厥文化与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芬兰 - 乌戈尔文化的强大影响，这是古罗斯文化民族起源的原始层。

显然应该说 斯拉夫文化、突厥文化和芬兰 - 乌戈尔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传统还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就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东斯拉夫文化或者古罗斯文化本质上就是整个古罗斯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文化。它成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在人种关系中，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人类学类型的大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三种民族文化传统的交汇处——在乌拉尔 - 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伏尔加 - 卡马河沿岸积极进行的。

伏尔加 - 卡马河地区是历史形成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民族文化的自然“边区”，在这里形成了成为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明的基础的文化深层结构。基辅罗斯的“森林与草原”的边区，一方面 将定居的东斯拉夫部落分散开 同时又联系起来；另一方面 将哈萨尔汗国 还有突厥的游牧人（佩彻涅格人、波洛伏奇人）尔后是游牧的蒙古鞑靼人分隔开来，同时又联系起来。伏尔加 - 卡马河地区是两条河流的会合之地，其边界是不严格的，模糊的（森林、沼泽）。相邻的民族与文化的互相渗透从容不迫，不知不觉。

莫斯科公国的首都形成的地方是东斯拉夫和芬兰 - 乌戈尔文化的结合处，莫斯科这个词本身就是芬兰 - 乌戈尔语。当 H. 别尔嘉耶夫把莫斯科公国的文化主要说成是“东方文化”，是“被基督教化了的鞑靼公国的文化”的时候，他并不完全正确。民族文化的综合首先是东斯拉夫和蒙古鞑靼文化成分的综合，其次是基督教与多神教文化成分的综合。这种民族文化大综合完成了整个文化的原始组成成分外在的、很多方面是表层的一体化。而在这个

民族文化大综合的深层之中是一种共生，是斯拉夫文化时而与芬兰 - 乌戈尔的文化混合 时而与突厥人的文化相混合 到后来 已经作为共生的民族文化再与蒙古鞑靼人的文化混合在一起。

游牧文化 重要是突厥人的 之前是印度 - 伊朗人的文化) 和定居文化 (东斯拉夫和芬兰 - 乌戈尔的文化) 的交汇常常被称为 “ 骑马人和庄稼人 ” 的汇合。对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意义来说，第聂伯河民族大团结的中心 (在这里形成了古罗斯的部族) 与在伏尔加流域中部的中心 (在这里形成了布加尔人部落) 是同等重要的，尽管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大混合在这两个地区实行的原则不仅不一样，而且在很多方面是互相排斥的。在伏尔加河中部和乌拉尔附近地区芬兰 - 乌戈尔人的文化和突厥人的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一体化过程比在基辅罗斯进行得更加积极，更加迅速和更加深入。东北的民族文化综合的结果比起南方的文化综合来说，更具本质性，更加巩固。在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共同之点则是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与行为的令人奇怪的融合。在北方是芬兰 - 彼尔姆和印度伊朗的，随后是突厥人的融合；在南方则是东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融合。

如果说 东斯拉夫文化和突厥文化、芬兰 - 乌戈尔文化的共生是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综合体的原生层，那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与斯堪的纳维亚 (瓦兰吉亚人) 的文化和希腊人 (拜占庭) 的文化，还有南部斯拉夫 (古代保加利亚人) 的文化进行的融合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综合体的再生层。瓦兰吉亚文化和希腊拜占庭文化及南斯拉夫文化在西南方向最终进入，相互作用并扩展到整个基辅罗斯的领土之上。如果说，古罗斯文化的民族起源的再生层在很多方面带有人为的性质，是被国家和宗教活动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决定的，那么民族文化综合体的原生层则是在漫长的时期，由于东斯拉夫与突厥人和芬兰 - 乌戈尔部落的长期充满矛盾的交往自然地形成的。这一社会文化共性形成的长期性本身，还有在古罗

斯和俄罗斯文化中东斯拉夫文化、芬兰 - 乌戈尔文化和突厥文化共同的历史延续性是在三者中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宽容性和兼容性的结果和保证。

（四）俄罗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其他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古罗斯人主要从事农耕，但林业和牧业在罗斯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尤其是农耕生活，对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俄罗斯民族虔诚的宗教意识有着深刻的经济生活的背景。

第二、在形成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过程中，农村公社起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的农村公社是在东斯拉夫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它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在农村公社中，住宅、劳动工具、小块耕地和劳动产品是私有的，森林、牧场、水源和土地则归公社所有，集体使用。农村公社在疆界上往往与自然村相同，因而人们又称之为村社。

农村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它与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

俄罗斯的村社从基辅罗斯起，经历了 1 000 多年的历史，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村社是俄罗斯农村 1 000 多年的基本社会结构，农村村社不仅具有经济职能，而且具有政治职能，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政社合一的组织。农村村社制度在经济上的特点是：①土地公有，定期重分；②在征税、徭役方面实行联环保制度，以村社为单位，集体向国家和领主定租纳税；③与联环保相联系的是集中居住、集体劳动、共同耕作；④在土地分配和赋税分摊上实行平均主义原则；⑤组织互助合作，接济贫穷孤寡。村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宗法共同体一方面把农民世代代束缚在村社这一封闭狭

隘的天地之中。从生到死，村社就是农民全部的世界（俄语中村社“米尔”мир与世界是同一词）。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都与村社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村社又是农民与国家的中介，向农民提供保护和帮助，使农民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竞争的风险。

农村村社千百年来将俄罗斯 90% 的农民束缚在村社这块封闭狭隘的小天地中，生老病死，繁衍生长，使他们的意识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可以说，正是村社生活培育了俄罗斯民族虔诚的宗教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传统道德的基石。

村社制度的核心是农民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高度依附，共同体束缚个人同时保护个人，排斥个人自由和权利。

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村社共同体，重集体轻个人是维系村社的起码的行为规范。个人对村社的服从抑制了农民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生长，顺从权力倒成了人人自觉的主导意识。人们的行为往往力图得到集体的认可，或者得到长官的准许。

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保守心理。对不符合传统的新生事物他们总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对自己贫困和毫无权利的生活却安之若素，习以为常。

村社生活也培养了集体主义和平等的精神。既然个人微不足道，只有村社集体才有意义，那么，集体主义的互助观念和习惯的形成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互相救济、无偿帮助陷入困境的人是起码的行为准则，行善作为道德义务在村社农民中也沿袭成风^①。

村社还是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庆典的组织者，潜移默化地培养着人们虔诚的宗教意识。在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和封闭的村社环境中，个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又使得农民在心理上永远感到自

详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 188～191 页。

己是可怜卑微的被压迫者，而农民基本上是文盲，对上帝和其他神明的顶礼膜拜是他们自我精神解脱的必然选择。

第三、俄罗斯领土辽阔，其广大的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也使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东方文化的制约，深深地打上了文明结合部的烙印。

说到东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形成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两条商路，一条是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的“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另一条是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商路。

利哈乔夫指出，“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起了决定性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

拜占庭文化对斯拉夫人的影响最早开始于军事斗争和经济交流。斯拉夫人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不断进犯，使斯拉夫人接触并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技能和生产技能。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瓦兰吉亚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到拜占庭的“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发挥出来的。“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商路，沿着这条商路，斯拉夫人不仅发展了同拜占庭的经济联系，而且拜占庭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向罗斯渗透的。俄罗斯初期编年史上记载了一篇圣诗《安德烈·别尔嘉耶夫沃兹传》，诗中主人公就是沿着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的大路至波罗的海然后环游欧洲和罗马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从风俗习惯到宗教信仰，从衣食建筑到文学艺术无不打上东方民族的深刻烙印。而俄罗斯接受拜占庭文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加利亚人进行的。按利哈乔夫的观点，通过从

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的商路，保加利亚书籍传到罗斯人部落，但是最重要的是传入了保加利亚人的标准语——教会斯拉夫语。“多亏保加利亚的文字，基督教立刻以具有高雅文化的高级宗教的形式进入罗斯。”

沿着从瓦兰吉亚到希腊的商路，进入古罗斯部落的不仅是拜占庭的文化，还有北方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亚人的影响。瓦兰吉亚人被芬兰人称为诺曼人，意思是北方人，在东斯拉夫人那里是商人的意思，他们奔波于斯堪的纳维亚西半岛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事商品交换。据《往年纪事》记述的传奇，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者就是东斯拉夫部落从瓦兰吉亚人那里邀请来的，从瑞典请来的王公在掌管东斯拉夫部落的同时，也带来了北方日尔曼大公军事政治体制。这与罗斯东斯拉夫传统的市民大会机制相结合，形成了后来的罗斯的大公——市民大会制度。

如果说，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主要给东斯拉夫人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从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商路则沟通了斯拉夫人与东方民族的联系。正是沿着这条商路，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扩展到伏尔加河流域。在罗斯受洗之前，罗斯的近邻，常常与罗斯人打交道的哈扎尔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尔加人就信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东方穆斯林的文献中曾提到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为了了解伊斯兰教，派使节去花刺子模。这证明了罗斯在选择国教时，表现出了对邻国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很大兴趣。东方民族的文化对罗斯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应推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经历几百年的基督教化的过程，以东正教为标志的西方文化沉淀下来，与俄罗斯的民族道德传统相融合，构成俄罗斯厚重的文化底蕴，对俄罗斯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规范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基督教为俄罗斯的西方化提供了精神要素，那么 13 世纪蒙古征服者则为俄罗斯的东方化奠定了政治基础。蒙古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罗斯的表层生活，更以自己的政治军事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莫斯科的大公们从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中获得专制权力的概念，并按蒙古的方式发展军事、土地、政治制度，形成了农奴制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教会依附于王权，绝对服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和忠实于东正教的信仰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总之，俄罗斯文化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俄罗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技术和传统基因。按照 П. Н. 萨维茨基的观点，俄罗斯历史同一性的基础是它的中间性。它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也不是亚洲的继续，而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历史的地缘政治的特殊现实——“欧亚结合体”^①。俄罗斯的欧亚实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物质的西方与精神的东方的历史对话，物质西方追求向自然的不断扩张，精神东方保持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回忆。东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潮流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的精神空间的碰撞，决定了俄罗斯精神内核的本质。^②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自己原始基因的产物，而我们呢 不是国家 而是国中之国 世界之中的世界 我们是两种原始基因的继承人。我们生来就是半人半马的人马座。因此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有着特别的依赖——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捷尔在《欧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М.: Книга, 1991. с. 145.

② Замятина Н. Ю. Зона освоения (фронтир) и ее образ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х.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1998, № 5. С. 15.

亚大陆大厦》一书中就这样写道。^①

二、术语 *менталитет* 与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

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俄语表述常常用 *менталитет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要科学地认识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 就不能不对俄罗斯学术界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менталитет* 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

术语 *менталитет* 来自拉丁语 *mens, menti's* (智慧 思维 思维方式 精神结构) 也与它派生的形容词 *mentalis* 有关。*mentalis* 一词最早出现在 14 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语言中。17 世纪在英国出现了哲学术语 *mentality*。到 19 世纪 *mentality* 就进入了西方思想的科学术语中。在大部分欧洲语言中, 它的发音大致相同。法语是 *mentalite*, 英语是 *mentality* 德语是 *dia Mentalitat*。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 (P. Emerson) 在 1856 年的著作中就使用了 *менталитет* 这一术语。爱默生在把灵魂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看做是价值和真理的本源时, 采用了 *менталитет* 这一术语。这个概念新康德派、现象学派、精神分析学派也使用过。到了 20 世纪 法国的学者对 *менталитет* 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 普鲁斯特 M. Proust) 有意识地将它收进了自己的词典。

对“原始的 *менталитет* ” 概念形成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是法国人类学家累维 - 布律希尔 (Levy - Bruhl) 。他强调从现代概念出发来解释无文字民族的集体生活是一种危险的企图。累维 - 布律

^① Гефтер М. Я. Дом Евразия. М., 1991. С. 465.

^② Левит С. 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XX век. Словарь.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 1997,